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奋力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坚持绿色发展 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邹伊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这明确了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绿色发展。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其庞大的河湖水系和独特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发挥着涵养水源、繁育生物、释氧固碳、净化环境的强大生态功能,维护着我国重要的生物基因宝库和流域生态安全。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一环,应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从而为中华民族筑牢坚实的生态支撑与发展根基。

绿色发展理念的本质,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取向。这一思想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早在春秋时期,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唯有先顺应自然,遵循自然法则,避免对自然造成破坏,方可达成自在之境。战国时期,《管子》一书也指出:“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其意思是说山林川泽平原虽然肥沃、富饶,但如果不合理利用,盲目采伐,无节制地蓄养牲畜,不注意生态平衡,必定会堵塞财富的来源。这些生态智慧清晰地揭示了人类活动与自然存在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命活动、感觉、思维等都源于自然,也依赖于自然的物质条件。因此,一旦人类过度破坏自然界,将会遭到自然界的反噬与报复。恩格斯也提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基于对自然规律深刻理解和尊重之上的生存之道。这些思想都深刻阐释了人类发展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坚持绿色发展,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长江经济带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涵盖沿江十一个省市,得益于长江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和资源禀赋,钢铁、汽车、电子等现代工业的精华大部分汇集于此,集中了一大批高耗能、大运量、高科技的工业行业和特大型企业。长江经济带是整个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除沿海开放地区以外,经济密度最大的经济地带,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是其他经济带所无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快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有所影响。许多沿江企业高度依赖长江供水与排污,但其环保意识滞后、治理能力欠缺。部分企业直接将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未经有效处理便直排入江,导致长江多个支流遭受重度污染,水质不断下降。加上由于自然因素以及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土地开发、陡坡耕种、乱砍滥伐等人类活动,长江上中游许多山丘地区水土流失日益严重。这不仅导致土壤肥力下降、耕地退化,严重阻碍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还造成大量泥沙淤积下游河床与湖泊,削弱行洪能力,进一步加剧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洪涝灾害风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长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进入“十五五”时期,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已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速的快慢,更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增长。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事关当前和长远发展全局,需结合规划纲要制定,依靠改革创新实现重点突破,保护好生态环境。当前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修复长江生态、保障流域安全、提升发展质量,真正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首先,严守生态底线,抓实长江全域生态保护修复。坚持绿色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正视以往发展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韩正在《寂静的春天》的译者序中写道,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保护自然,自然才会给我们更多的回报。在恢复生态健康、筑牢绿色屏障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为此,必须坚持法治与治理并重、保护与修复同步。一方面,强化法治保障,推动长江保护从有法可依向依法善治深化。坚持以制度守护生态红线,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并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制度体系。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加大对非法排污、非法捕捞、侵占河湖岸线等突出违法行为的全链条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先在充分遵循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顺应自然,给大自然休养生息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依靠自然的力量恢复生态系统平衡。同时要运用人工修复手段,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以长江上游的赤水河为例,作为长江上游唯一未建坝的一级支流,通过全面禁渔十年、拆除小水电站等具体措施,短短数年间鱼类资源量显著回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不断增加。通过法治红线与生态绿线的双重守护,长江经济带正逐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真正实现“一江清水向东流”的美好愿景。

其次,聚力绿色转型,优化沿江产业经济发展布局。在2025中国经济年会上,第二十届中央委员韩文秀表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长江经济带沿江两岸重化工业布局密集,落后产能占比偏高,环境风险高、资源消耗大的产业格局亟待扭转。为此,需对产业结构进行系统性优化,保障长江生态安全,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严守底线,把不符合要求的产业挡在长江之外。要严格执行沿江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确保涉及长江的投资建设活动,都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建设,以约束推动产业升级,严控重化产业沿江无序布局,严防污染产业向上游地区转移,杜绝“污染搬家”现象。另一方面,培育新动能,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培育清洁能源、生态文旅、绿色农业等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绿色产业聚链成群、集群发展。同时,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工业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废物近零排放。例如,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通过构建企业间废物交换利用的循环经济链条,化工企业之间形成上一家的废料成为下一家的原料的局面,将废料变成了新的资源。把绿色发展理念植入产业链、融入生态圈,通过减存量、控增量、优布局、强动能,推动沿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以产业绿色转型的实效,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最后,强化协同联动,健全跨区域联防共治工作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环保为民,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更加注重源头治理,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区域治理协同,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部,涉及十一个省市,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相互影响、彼此依存。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不是一个省或一个市之事,而是全流域的共同责任。一方面,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各地协同护江的积极性。要加快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跨省域补偿制度,明确上下游之间权责对等的联动关系。通过资金补偿、产业协作、对口支援等多元化方式,推动上游地区主动护水、中下游地区合理补偿,形成上下游同心护江、合力治江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构建统一信息共享平台,提升跨区域协同治理的实效性。依托大数据等现代智能技术,搭建覆盖全流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推动各省市共享水质、排污、污染源等监测数据,打通跨区域信息壁垒,及时发现并协同处置跨界污染问题。以长江大数据中心为例,初步实现了提供统一数据服务功能,并利用区块链技术,着力打通信息壁垒,联动行业内外多家单位与机构,有效支撑协同治理实践。各方拧成一股绳,汇成一股力,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以高效能的协同联动,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治理支撑。

铜仁市位于武陵山区腹地,是长江中上游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组成部分,铜仁立足自身生态禀赋和发展定位,始终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贡献地方力量。具体而言,铜仁以锦江、乌江及其主要支流等重点水域为发力点,系统推进水域岸线管理保护,严格水域岸线用途管制,推进水域岸线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实施河岸带生态防护、水土流失防治等工程,全力推进重点流域中小河流治理。在强化治理的同时,与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长江办、铜仁学院等联合成立小江藻类异常繁殖跟踪研究课题小组,并筹备建立水生态实验室。近年来,依托优良生态环境,铜仁市大力发展绿色茶产业、生态特色农业等绿色富民产业,推动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这一系列举措,既守护了长江流域上游的生态安全,也走出了符合本地实际的绿色发展道路。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当前,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守住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条主线,把绿色发展贯穿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全过程,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一江清水更好地惠泽人民、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王明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奔涌而至,全球发展格局深度重塑,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需牢牢把握科技创新主动权,激活发展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驱动国家发展行稳致远。

科技创新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三个维度。首先,科技创新提升了劳动者改造世界的能力,打造了一支适配时代发展的新质劳动者队伍。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域下,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中的重要元素,也是生产活动中具有主观意识、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活跃要素。而科技创新通过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养、创新思维与专业能力,推动劳动者向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转变。列宁曾强调:“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更广大的群众运用它们。”

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技术赋能是劳动者实现自身发展、释放生产潜能的重要路径。以铜仁市德江县脱贫群众黎勇的经历为例,黎勇通过焊工技能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从打零工的“散工”转变为持证上岗的“技术工匠”,日收入从一两百元提升至四百元,实现稳定增收。这充分说明,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的新质劳动者,能够突破传统就业局限,实现劳动价值提升。这种由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适配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质劳动者,加速了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理论构想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次,科技创新赋能重塑劳动资料,形成新质劳动资料。劳动资料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运用的物质资料或物质条件的总和,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还涵盖了劳动过程中所需的基础设施、辅助材料等诸多要素。而新质劳动资料的核心,是科技创新所提供的更高效、更智能、更具突破性的劳动工具,它可以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劳动工具的革新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而科技创新的介入,让这份“利器”实现了从“量”的变化到“质”的飞跃。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提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诠释了若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劳动者也难以完成既定的劳动目标。而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米”,正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至关重要的新型劳动工具,是恰好为回答时代之问、破解发展难题送来的关键之“米”。贵州红星发展大龙锰业公司建立了5G智控中心,运用大数据、数字孪生技术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在设备运行监控准确率提升的基础上,降低了人力维护成本,便是典型实例。科技创新通过对传统劳动资料的改造与升级,培育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劳动资料,帮助劳动者完成高难度、高风险的生产任务,使其成为联结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纽带,充分彰显了科技赋能生产力变革的时代价值。

最后,科技创新拓展、丰富劳动对象的范围与存在形态,衍生出了新质劳动对象。在传统生产力模式中,劳动对象的利用效率受限于劳动者的经验和劳动资料的水平,而新质劳动对象的出现,使劳动者可以通过掌握数字技术,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价值转化。新质劳动对象指的是由数字技术创新所提供的海量数据和信息,它们通过有效地收集、整理和利用从而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论及生产力发展时强调:“劳动对象的变革与拓展,是生产力水平跃升的重要标志,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都必然伴随着劳动对象的革命性更新。”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一论断得到了最为深刻的印证。铜仁通过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上线梵净生态账户,将生态保护、绿色出行等行为转化为可量化、可增值的生态积分,21万余户企业和群众开通账户,累计发放绿色贷款超120亿元,让生态资源成为可变现的生产要素。这些由数据、生态资源组成的新质劳动对象,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深度融合,推动铜仁新质生产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此,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新质劳动对象,是新时代新质劳动者开展生产实践、创新创造活动的重要支撑,更是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性战略要素。

2026年,党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铜仁市应继续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紧扣本地产业特色与资源禀赋,统筹布局科技创新领域重点任务,持续培育壮大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在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铜仁力量。

以普遍联系理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李昕雨

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其本质上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促进各区域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经历了许多调整,部分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优势未能及时转化,而另一些地区则凭借区位条件率先融入市场,区位发展差距逐步扩大。“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一部署不仅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更是下好“全国一盘棋”的重要举措。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首次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构建了普遍联系的体系,将自然、历史和精神描绘为不断运动发展的整体过程,但缺乏对复杂结构性联系的分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实现了从观念联系到物质联系的转变,指出联系是物质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联系理论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上面去考察的。”这解释了世界万物不是孤立事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蕴含规律性、哲理性的有机整体。奥尔曼也进一步从本体论层面提出,任何事物都是由其在整体关系系统中的位置和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其孤立属性所定义的。从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理论来看,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将其运用到区域协调发展上不难看出,任何区域都无法脱离其赖以生存的世界关系网络,它们的资源流动、资金流动、人口流动、信息流动、生态流动与其他区域乃至全球都紧密相连。我国不同区域及其内部有着广泛的交互共生的联系,各地区间的区域协调发展,既表现为资源环境与产业基础之间的内在关联,又表现为与其他区域长期交换所形成的变化与沉淀的外部关联。

从联系的条件性来看,铜仁地区的抹茶原料——碾茶,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茶饮产业的重要原料基地,其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优越的自然条件。该地区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微量矿物元素,且拥有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优质生态环境,在碾茶种植方面具有较为显著优势。相比之下,东部平原茶区虽然加工设备先进,但缺少高海拔、富硒土等生态条件,难以产出同等级的碾茶。这种自然资源以及生产条件的差异决定了铜仁地区每增加一单位碾茶产出所放弃的其他产品价值会低于东部茶区。然而,仅有自然禀赋并不能转化成全局性的发展优势,还需要通过外部环境的联系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碾茶生产要想成为支撑铜仁向全国茶饮市场递交的“新名片”,需要通过交通网络、市场资源以及制度安排与消费需求市场建立起一条持久的、双向的物物交换渠道。

从联系的普遍性来看,区域间的贸易联系会影响协调发展的运动轨迹,而横向的、平等的交换关系有助于推动各区域共同繁荣。国家依托“看得见的手”在区域发展差距与发展目标之间进行调控,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市场建设等方式,大大降低了跨区域运输成本和损耗成本,使碾茶覆盖到更广阔的消费网络,将抹茶原料生产与全国消费需求紧密相连。东部地区原料自给率较低,依赖铜仁地区的原料供应为其分担部分压力,然而铜仁地区在资金引入以及技术进步方面相对薄弱,输出的是初级农产品、引入的是最终消费产品,在交换关系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因此,铜仁地区的发展困境不应被简单归为边境地区位置偏僻或自身能力不足,而是应该理解为一种不对等的联系,这种关系结构使其发展缓慢。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阐明,辩证法的任务是穿透现象世界的碎片化假象,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体结构。由此,铜仁可以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合作、拓展开放通道等发展方式,使自身从“输出者”转变为“共享者”。综上所述,铜仁碾茶生产基地的发展过程是在依靠特定的自然条件基础之上,结合市场交换的持久性、制度调控的引导性、社会交往的融合性逐步演变而成的。

重新审视“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一重要举措,其时代意义已经从“补短板”上升到对新发展理念中协调发展的深刻把握。铜仁地区的原料生产优势是在长期与其他地区贸易以及向国际市场开放中被逐步激活和放大的,同样,其发展困境也只有置于普遍联系的理念中才得以解释和解决。因此,“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必须将铜仁地区置于国家整体发展网络之中,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理论在中国区域治理中的辩证运用,更是新时代下对新发展理念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